

十周年紀念感言

蕭蓬先



世界倫理的建構必須是一「極小式的」倫理，否則就不可能為不同的宗教、文化傳統所接受。世界倫理宣言所要求的是人的內在態度的轉變，那麼儒家式的進路有其殊勝之處，也就不言而喻了。這個時代不再是一元獨霸、西

風壓倒東風、或者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而是多元互濟、交流對話的時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克服文明衝突、免致地球毀滅的希望。

在陳方正所長的領導、劉青峰主編與金觀濤協助之下，《二十一世紀》昂然進入十周年，成績斐然，有目共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令大陸盛極一時的文化運動以及改革的企圖受到頓挫，一時萬馬齊喑，《二十一世紀》在香港這樣的邊緣地帶提供了一片園地，讓海內外學者發表高見，的確起到了作用。特別對大陸來說，有深切反省、旁敲側擊，乃至引領風騷、外轉內銷的功效，十年的積蓄，已不能令人忽視。而創刊伊始，二十一世紀好像還在遙遠的未來，不想不知不覺已經跨入了新的世紀、新的千禧，不能不叫人感慨繫之！

「世紀末」的感受最早流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末曾飽受Y2K的威脅，結果平安無事。除夕與往常一樣，守歲之後挖覺，睜眼已是新年新禧，並無異

狀。人的問題依舊持續，等待着我們以新思維去面對。新的世紀仍然是兩個表面上看來相反的趨勢加速進行中。一方面是離心的傾向，多文化主義流行。西方自啟蒙以來建立的普世主義的文化理想受到挑戰，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的霸權受到強烈的譴責，連帶科技商業主義的流弊受到嚴厲的批判。另一方面則是向心的傾向，世界已成為一個日益縮小的地球村。各傳統不再隔離在不同地區發展。宗教、文化雜處，彼此之間打交道成為家常便飯。就在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的警告的當兒，孔漢思(Hans Küng)作出了簽署世界倫理宣言的努力。依他之見，只有各宗教文化傳統能夠捐棄成見，存異求同，凝聚共識，才能避免矛盾衝突、同歸於盡的命運。這就是在當前所面臨的處境。

我曾經說明，我不屬於狹義的當代新儒家的統緒，但也不會反對學界一般把我歸入海外或港台新儒家的意見，因為我確認定儒家傳統中有萬古常新以及與時推移的成分。下面我就由這樣的視域面對我們當前的處境作出回應。和上一代在1958年元旦簽署《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學者相比，我們這一代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那時正當存亡繼傾之際，故突出了心性之學的道統，也強調了吸納西方科學、民主的必要。如今我們吸收西方之長是理所當然之事，而西方知識份子也捐棄了以往傲慢的態度，學習尊重異文化，不再把西方的價值就當作普世價值。反過來，我們也無須強調儒家的正統意識，那同樣是過時的東西。在多元架構的預設下，我們只需闡明儒家傳統「內在超越」的方式，可以是一種合理的終極關懷，便已經足夠了。而大量的經驗研究闡明，日本與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確都有儒家背景，但各地成功或挫折的因素都不一樣。自從制度化的儒家在清廷覆亡之後宣告終結，兩岸三邊已不足自居為儒家之正統。韓國所保留的儒化的風習更多於台港大陸。而各地的儒家傳統發揮了不同的功效，難以一概而論，乃有一種「非正統」、「非中心化」的傾向。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願意陷入相對主義的窠臼，這正是我們必須着力加以澄清的所在。

在這裏，世界倫理的建構為我提供了重大的啟示。它必須是一「極小式的」倫理，否則就不可能為不同的宗教、文化傳統所接受。它不能無所排斥，如果一切可為，要這樣的倫理何用？孔漢思以Humanum(人性、人道)為宗教的通性，將「金律」——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視為世界倫理的基石，四個實際行為的指令是「不殺」、「不盜」、「不淫」、「不妄」的現代闡釋。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這是十誡中有關道德倫理的四誡的表達。但我仍加以強烈的支持，原因在他雖仍用西方的文字和概念來起草宣言，其意涵卻超越了西方的藩籬。實際上，佛教殺盜淫妄酒五戒，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所指涉的正是類似的東西。而世界倫理的建構之所以可能，也正是因為由不同傳統發展出來的道德規條確有彼此若合符節之處。

西方學者用歸納的方式找到像「金律」一類的基本原則，四誡一類的禁令，再加上一些程序上的普遍規定，由此而看到世界倫理建構的可能性。但實際建

構決不限於西方的文本，每一傳統都可以自訂條文，參與國際性的討論，作出特殊的貢獻。在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舉辦的「普遍倫理計劃」的國際會議中，我就曾提出論文由新儒家的視域看世界倫理。我的論點涉及方法與內容兩個層次。從方法學的觀點看，歸納的取同略異的做法是不足夠的。我提議給予「理一分殊」以現代闡釋，用朱子「月印萬川」的方式，才能夠不取消差別而找到會通的可能性。「理一分殊」能夠提供縱向與橫向、貫通古今中外的方法途徑。如果我們能夠分別開傳統中萬古常新、與時推移的成分，古代的金律與五常自然可以重新加以闡釋，賦予其適合於現代處境的涵義。同樣理念也可以容許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儒家給予類似而不同的文字與概念的表達。同時世界倫理當然有內容的指涉，不能只是有關形式、程序的規定。只不過任何有關價值規範、道德規條的成文表達，就已受到具體時空處境的約束，而失去其抽象的普遍性。仁心的表達古今不同，不可勉強歸一，否則就會造成僵化、負面的效果。但孟子指點的，孺子之將入於井所引發的怵惕不忍之心，卻的確可以不論古今中外的差異而激起共同的感受。當然孟子的良知不能單純當作心理的反應，它指向一既超越而內在的根源，此處不能申論。由現在對於「理一分殊」的了解，一切成文的表達，包括儒家的表達在內，已經屬於「分殊」的層面。但「分殊」指向「理一」，那是「道可道、非常道」、「上帝以上的上帝」的層面。但由分殊層面之若合符節，通過信仰，即可以指向一超越的存在、價值之源，已非我們通過邏輯推理、經驗推概可以證立的層面了。它可以被了解為康德 (Immanuel Kant) 所謂不得不作的「基設」，但港台新儒家寧可以之為在自己生命之內發出的直接呈現。而世界倫理宣言所要求的恰正是人的內在態度的轉變，不能只滿足於1948年簽署的人權宣言那樣的法律文件。那麼儒家式的進路有其殊勝之處，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孔漢思指出，這是一個「典範轉移」的時代：它不再是一元獨霸、西風壓倒東風、或者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而是多元互濟、交流對話的時代。這並不是要人不再追求真理，放棄自己的信守，而是在建立了自己的終極關懷之後，還要採取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才能使各人植根在自己的基礎上，不為自己的成見所拘，不斷作自我的擴大，以指向於終極的真理，追求存在與價值在現生的進一步的具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克服文明衝突、免致地球毀滅的希望。

而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由完全不同的出發點得到了相同的結論。作為史家，他認為日本之現代化速度遠勝過中國決不是偶然的結果。日本富於競爭精神，效忠天皇，並沒有真正的天下觀念。但西方式的競爭模式已經發展到了盡頭，再持續下去會產生毀滅性的結果。以此他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指導原則應該是傳統中國文化天地萬物一體的襟懷，與調和共存的做法。有人乃至以為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但我對此有很大的保留。傳統中國天人合一的理念固然有環保的意涵，但1999年3月1日《時代》(Time) 雜誌報導，當今世界最污染的城市中國十居其九。而中國傳統調和共存的智慧要不能阻止海峽兩岸的熱戰，

那又有甚麼用呢？故我要呼籲回歸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睿見，光只說一些漂亮的空話是沒用的，只有真正按着理念行事，由身邊做起，才能造成海峽兩岸的雙贏局面，並促進世界的和平。這就是我在《二十一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感言。

劉述先 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講座

中國國民性問題

劉廣京

最近在溫習早年熟讀的兩部書。一部是亨丁頓的著作，認為中國歷史上災荒頻發對中國國民性有極大的影響；另一部出自雷海宗先生，他強調中國的武德與文德的意識足以影響行為與態度。今天，五六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國民性有沒有新生？

轉眼就是2001年1月1日，西方世界二十一世紀正式的道臨。這是英國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說法，所根據的是1582年羅馬教皇Gregory XIII關於如何計算公元世紀的詔示。但是陳方正先生於1999年12月在《二十一世紀》發表〈站在美好新世紀的門檻上〉，似認為2000年1月1日就進入新世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應與格林尼治天文台同具權威性。

我收到十周年紀念徵文時，恰巧正在溫習五六十年前在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熟讀的兩部書。第一部是亨丁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原作，潘光旦先生譯述及整理的《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1929, 1933再版)；另一本是雷海宗先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40)。近來的讀者好像不太注意這兩部書。下文我想僅就這兩本書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論點，略作介紹。

劉廣京教授(右)與李遠哲教授(左)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會議上。

